

XIANDASHESHEHUIXUEBIJIAOYANJIUCONGSHU

社会政策的计划观点

——目标的产生及转换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联邦德国〕伊蕾娜·迪克森著
李路路 朱晓权 林克雷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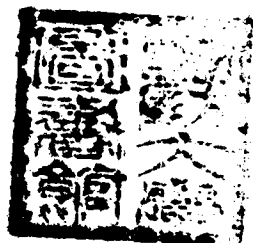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XIANDASHIHEHUIXUEBIJIAOYANJIUCONGSHU

社会政策的计划观点 ——目标的产生及转换

〔联邦德国〕伊蕾娜·迪克森著

李路路 朱晓权 林克雷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社会政策的计划观点——目标的产生及转换

〔西德〕伊蕾娜·迪克 著

李路路 朱晓权 朴克雷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89 插页3 字数156000 印数1—29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360-7/C·40 定 价: 3.05 元

编者的话

社会学，如果说在我国几年前还属于刚刚“复活”的新学科，如今可以说这一学科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从而进入了酝酿着重大突破和发展的新阶段。

社会学以其综合性的视野和独特的研究角度，使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它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社会学在学术界不断上升的地位，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越来越多地应用，我国把“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或计划改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或计划等等，就是明证。

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都在现实研究和理论思考两方面向更深入的层次发展，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断生成新的理论，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比较借鉴。

这套“比较研究丛书”是借鉴的窗口，这里的“比较”，就是借鉴。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已是这套丛书的第三批了。通过这套系列丛书，我们将把经过选择的外国社会学著作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让人们在发展我国社会学的时候，对国外已有的成果有所了解，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一步开拓思维空间，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去攀登社会学发展的新高峰。

在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各学科丛书林立的今天，《现

G77-82 / 25 08

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已开始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成为这套丛书的批评家和赞助人，使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大家的读书和创作园地，伴随着中国社会学从“复活”走向发展成熟，为推进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学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一九八七年九月改于北京

译者前言

本书是一部关于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的社会学专著。社会政策很久以来就是社会科学讨论的重要内容，因为社会政策是社会科学由原则变为行动的显著标志。社会政策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为解决未来的社会问题而制定的行动准则，而社会计划是社会政策的具体应用。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作为社会管理的实践活动，在我国早已存在，但作为一门科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我们曾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化。

我们翻译此书的目的，是希望将有关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的国外研究介绍给国内有兴趣的读者。我们之所以选择联邦德国社会学家伊蕾娜·迪克的这部著作，是基于这样几点考虑。首先，作者并非一般地讨论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而是将它们既作为科学、又作为实践，着重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本书不仅有大量的理论探讨，而且包含着实际的案例研究，使我们具体地看到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第二，作者非常广泛地探讨了社会政策的出发点。作者不仅回顾了社会政策研究的历史，而且从人类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群体心理学、特别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政策应是全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是进行有

计划的社会变迁的科学政策。因此，作者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形成社会政策的参照系、情景联系以及它们的功能和内容。第三，作者还着重讨论了社会计划的目标，认为在当代，尽管社会计划的制定可达到程序化、计算机模拟以及采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模型，但决定社会计划效用的，仍然是在广泛的社会参照系和社会情景联系背景下以价值取向和未来取向为基础的社会目标。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本质上是目标的形成和转换，因而作者详细讨论了社会计划中的目标发现、目标确立、目标构成、目标类型、目标实现和目标实现悖谬问题。最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当然同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对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来说，联邦德国自二战后奉行的计划市场体制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之处，而此书正是这种体制的思维产物，这也是我们选择联邦德国这方面著作的原因之一。我们相信，将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对于我国的社会学工作者、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的制订者和有关实际工作人员来说，无疑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本书的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由朱晓权翻译，第三章的A、B、第一节由林克雷翻译，第三章的第二、三节、第四章、第五章由李路路翻译。因为我们水平有限，尽管在翻译过程中尽了我们的力量，但译文中错误、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译者

1988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问题的提出与目标的确定.....	2
作为科学和政策中整体化观点的社会政策.....	7
第二章 计划讨论中的“意图真空”	18
计划观念的发展.....	19
科学与实践中现实的计划讨论.....	24
第三章 目标的形成	55
对参照系进行分析的立场.....	58
参照系的分类	107
参照系在情景联系中的具体化	121
第四章 计划——目标的转换	146
情景联系的预测	148
预测的可能性和界限	151
附录：生活幸福还是生活机会?.....	165
计划的对抗性后果	170
第五章 社会政策的后果	183
作为“学习着的体系”的社会政策	184
作为任务的价值取向：对参照系目标构成因素的要求	186
附录：案例	188

把握计划的对抗性后果：关于社会政策的“计划教育	
学”.....	207
其余的重要问题	213

第一章

导 言

面前这部著作试图着手对社会政策的计划观点作一分析。如同后面还将指出的那样，社会政策就其既不具备一种可靠的理论工具，又不具备一种方法工具这点来说，它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如果它被理解为普遍的或整体化的观点，制定它的社会科学的阐释性和规范性维度在这种观点之内起着作用，那么，它就根本不需要上述理论和方法工具。

同样的看法在协调“部门政策”的目标与战略的意义上，也适用于社会政策的实际制定。社会政策作为科学及实践，通过设定某种整体观察方式，从而与奠定其基础的出发点和依据区别开来。它并不是先天既定的，而是一种任务，一种对理论估计、研究方法以及实际政策方案和措施的选择。联系到这一点，就必然对面前这部著作的要求作以下自我批评性的限制：

虽然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文献对有关主题有所分析，对各种实际观点有所讨论，本书对这些分析和讨论有选择地加以引用，但是，一方面，这里的选择标准仅仅具有某种概括性；另一方面——令人担心的是，这一点并不是非本质的——这些选择标准也来自作者必然有限的、局部的、主观的认识能力。

在这部著作中，不可能也不应该拒绝社会学方面的渊源，

而后者也表现为是一条通向社会政策的合理途径。本书对心理学方面的特殊兴趣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出来。作者完全承认在诸如经济学领域内知识的欠缺，还有种种论述这一主题的其他专门领域未能涉及或注意不够。

即便是在所运用的观点方面，书中提供的有限说明也表明了在这里所作的描述和解释一方面是有代表性的，另一方面又是极为简约的。要做到与主题观点的要求与范围相适应的话，那每一个别章节都将需要在量与质的方面作多重阐述和讨论。

问题的提出与目标的确定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资源匮乏、环境破坏及新的潜在冲突，都把未来的经济与政治摆在这样的任务面前，即发展保证继续生活的战略、保证生活质量，就是说，相应于新的和处于变化中的价值标准和要求，保证有生活价值的生活。

尽管科学不断进步，福利继续增长，保障相对提高，但生活和共同生活对人们来说仍成为问题。有些问题对于一定的区域、一定的社会阶层、家庭圈子中的年龄组或年龄段来说是典型的。另一些问题则显然是独立于这些因素且不能以传统看法解释的。它们简直是这种情况的信号，“即，有某种东西不对头”，人们感到这一点并对此作出反应，却未能使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简单明了。这些信号包括，日益增长的身心疾病和心理——社会疾病指数、严重的吸毒癖和自杀欲、压迫感和无聊感以及由此导致的堕落与犯罪、不求成就和“退出”沿袭至今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些新形式。受到各方面妨碍的私人范围内的社会行为、对公共事宜的冷淡或投机心理，都表明团结感和责任心的缺乏，以及伦理上和思想意识上的毫无约束。慢慢出现了

与传统价值支柱的背离，取而代之的是转求颇成问题的、新的价值支柱。

人们越来越需要在胜任生活方面求得帮助。主观要求与客观可能、情景要求与行为准备发生多重分歧。与此相应的是咨询和出版部门的繁荣，这些部门通过“专业文献”提供生活帮助，各种许诺将提高交往与办事能力、表现力、敏锐性和创造力的培训中心也繁荣起来。种种群体意识形态，灵学思潮、青年宗教及各种神秘主义的出现，一方面导致寻求感官刺激，另一方面导致非合理性（作为对于在合理性上面及有关领域中“作过份了”的一种反应）。接触与交往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东西，而是这样一些主要要求，它们由于孤寂、由于在极大的次级组织中平淡的、圆通而表面的关系、以及由于间接交往形式的增加而被诱发出来。所有这一切还由于上述宏观领域中的不透明性及无结构性的印象得到加强。由此导致在公共领域方面的距离感，从而回到那种（即便是容易面临危机的）私人领域，这些领域既不通过“中间成员”联系在一起，也不为“自由地带”所补充。

态度与关系问题由于社会间隔的新形式而变得日趋尖锐。变化了的社会分层的标准构成新的潜在冲突。区域性和阶段性矛盾、教育上的差别、隶属于特定职业群体、千差万别的特征标签、额外的歧视性特征，诸如年龄、性别、家庭地位等，——与同其他群体比较的相对剥夺感相联系——取代了“传统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了的“阶级冲突”。取而代之的是消息灵通者和主动者与闭塞单一者和被动者之间的矛盾，是由巧妙的操纵而行使权力的各种细微而有效的形式以及对权威进行的有力（直至使用恐怖方式的）批判与拒斥。

与缺乏约束性和整合性标准相应的是一种价值多元论和相

对论。尽管对政治制度的批判有增无减，怀疑主义伴随着科学的成就与日剧增，关于进步的信念也明显发生动摇，不过，不满情绪、不安全感、恐惧等等还是和希望凝聚在一起。这种希望便是：期待所有那些被视为值得追求的东西具有某种至少是未来的“可行性”，哪怕这方面或许只存在着最低限度的共识（Konsens）。

政治和科学迄今为止都试图运用适应的方法、或者说反向控制的方法进行阐述，可总是事倍功半。社会变迁，更确切地说，对工业化、都市化、官僚化等过程所带来的后果的控制最终都未能如愿。每个业已解决的问题都在自己身后引来一系列问题，每个被克服的危机都暴露出新的危机。传统的社会政治构想——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基督教社会学说——在其所有各不相同的特征和组合中，显然只能导致一种无法令人满意的现状，而不能缩小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即便能，那也多数是以牺牲现实为代价）。十分明显的是，它们是使传统的理想和价值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上，还不够灵活，或者是使现代社会的要求与自己思想观念相适应的整合性程度还不够。

这种状况唤起了计划方面的诊断家、治疗家、预言家和救世论者。在他们的当代图景和未来草图中，分析与诊断、解释，方案与药方很难分开，从而更难于评价。更何况在这一领域中，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与技术人员、精神分析学家与神学家、新闻记者与作家，都由于其极不相同的知识和实践背景而众说纷云。于是，我们便不得不有选择性地面对一种“后现代的、后工业的、积极的、协调的高质量社会或生态社会”，面对“我们时代的终点”，——借助“对方针的调整”，我们会碰到这一终点。这方面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到底是由“中心的振荡”还是“温和道路”使人离开“福利状况”而

“回到人的尺度”。“毫无办法的办法”是与“进步的极限”有关还是与“危机的极限”有关^①。

以上评注并不企图贬低这些理论观点，我们后面还将多次追溯到其中的一些观点。我们的批评所针对的是，这些理论观点的根源在于，由于那种不能负起行动义务并承担责任的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距离，这些理论观点主要是对既定的状况作评论（或价值自由的、或辩护性的、或控告性的，视其立场而定）。于是，接下去便（或多少客观地、或宣染性地）勾画出一幅新的、健全的、间或有些离奇的乐观主义世界图景。什么地方“老东西”该走到头了，它们便要么怕羞似地沉默不语，要么在克服这种东西的战略上表现得极不确定而且一般化。只要它们不具备一种完全简明而准确的药方——不论这药方是根治疾病的还是无关痛痒的，它们便总是这样。

与这些“理论”方案相应，自然也有具体的、实际的“抉择”，尽管这里暂时所涉及的是边缘的、常常是精华的现象，

① 参见B·吉森：《宏观社会学——进化论导论》，汉堡，1980年；D·贝尔：《后工业社会》，莱茵贝格/汉堡，1979年；A·厄齐奥尼：《活跃的社会。社会与政治过程的理论》，奥普拉登，1975年；H·赖特·米尔斯：《协调的社会》，维也纳，1978年；G·霍勒：《高质量的社会》，杜塞尔多夫—维也纳，1979年；J·de·罗斯内：《宏观。作为生态社会工具的系统思想》，莱茵贝格/汉堡，1979年；E·F·舒马赫：《我们时代的终点》，莱茵贝格/汉堡，1979年；K·施坦布赫：《方针的调整》，慕尼黑，1973年；N·I·梅耶、K·J·彼得森、V·索伦森：《中心的振荡。未来社会制度的模式》，汉堡，1979年；A·B·洛文斯：《温和的能量——我们社会的能源与工业政策改进方案》，莱茵贝格/汉堡，1978年；H·Ch·宾斯瓦格尔、W·盖斯贝格尔、Th·金斯堡：《国家农业工人工会的报告：离开福利状况的道路》，法兰克福，1978年；E·F·舒马赫：《回到人的尺度：经济和技术的选择》，莱茵贝格/汉堡，1977年；作者同上：《毫无办法的办法：关于使意义得以实现的生活》莱茵贝格/汉堡，1977年；R·R·格劳汉：《进步的极限？社会合理化的矛盾》，慕尼黑，1975年；A·托夫勒：《危机的极限。全球性的经济滞胀，风险因素与对策》，莱茵贝格/汉堡，1975年。

或者涉及某种向亚文化的不情愿的回复，这种回复由一种（始料未及的）趋向加以合法化，并在事后从意识形态上给予论证。除去下面这点以外，即，人们原本必然要么极有特权、要么极无特权，从而能够实际上（而不是一时的、业余的或为了研究目的的）决定自己对生活形式所作的极端的抉择，——除此之外，所有这些实验都表现出和前面所批评的那些理论观点相似的矛盾。我们社会的广泛变化，既不能通过微小的自我管理领域、通过在公社中或在反权威教育中的共同生活来实现，也不能通过各方调停或通过自纺羊毛和生物蔬菜来实现——虽然几乎所有的“抉择者”都是边缘的人，但是最终还是靠那个想要克服的社会来生活；这些行为虽然拒绝社会，但并不拒绝失业援助和社会救济金；它们所谴责的，正是在其中找到自己手工艺产品市场的经济体系，它们联合起来明确表达的政治观点，虽然是“抉择的”，但只是由于更多的混乱并冠以“绿色”^①这一悦人的色彩而与传统的党派有所不同。

从以上列举的那些暂时的、不完整的、无疑可加以指责而且也仅仅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中，我们想得出以下两点：其一，科学分析和构造实际政策的必要性；其二，对社会总系统秩序和控制的要求。

与此相适应的是眼下这种尝试，即给作为科学和政策中整体化观点的社会政策以这样的任务：讨论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把关于社会政策的解释当作计划科学来对待。由此，留待我们的问题是：通过干预和制定某种与价值相联系的、未来取向的、整体的社会政策，确定社会发展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的维度。

① 指“绿党”——译注。

作为科学和政策中整体化 观点的社会政策

对社会政策——作为科学的和实践的学科——的讨论，首先要求就其综合而动态的对象：社会的状况作一说明。我们并不想在此提出一条终极的定义，并因此将自己固定在特定的内容和有限的观察角度上。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个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社会的作用范围而发展一种与社会隔离的关系，好象可以毫无困难地把社会当作价值中立的事实加以定义和分析似的。

社会这一概念的历史，明显地表现出那些曾试图对它加以定义的人在立场和兴趣上的束缚。围绕社会概念的讨论也绝不仅限于现代社会科学。根据各自在科学基本立场上与逻辑实证主义、批判辩证论或现象学思潮接近的程度，人们对社会是什么、可能会、或者确切地说应该是什么加以精确定义，对其标志和界限加以规定；确定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或者说能够被）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完全具体地并作为重重交叠的社会形式感知到。带着在此寻找共同点的意图，人们可能冒虚构空洞形式的危险。因此，在我们看来，从方法工具入手比实体的具体构造更为重要。我们打算以运用整体方法的公设来回答上面的问题：“与整体的社会现实相应的，是社会科学中的整体方法，它使具体分析与概括性的综合相联系。整体方法把个别化的对象置于其各种制约性的联系之中，并使各自的特殊领域处于相互关系之中。”^①

① H·巴赫：《工业时代农民的农业》，柏林，1967年，第47页。

这一方法使我们有可能做到：如果在（处于与社会相联系的人们、群体和制度的）态度与行动的意义上，考虑到在社会团体及其秩序和控制中生活、共同生活并作出成就、因而把社会理解为社会生活形式的整体的话，便可以把社会定义为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①

在此意义上，我们从一种方法的多元论与理论构想上的多元论——尤其着眼于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结合——出发，将社会各局部现象之间的相互隶属性置于我们考察的前沿，这些局部现象组成作为整体的社会。对作为科学的社会政策的要求，也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作为实际政治学科的社会政策：这种社会政策在社会总系统的广泛秩序与控制的意义上，就目标观念方面来说，或者说，在对理想和价值的取向基础上，与社会的重大行动相关。而那些理想和价值本身又是作为科学的社会政策的对象。

在此意义上，作为科学的社会政策在各门社会科学中具有一个可明显确定的位置：它既享有和其他社会科学同样的“对象”，又和它们一样享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方法途径。但在其他阐释的和规范的社会科学中，没有一种认识到它们在这方面的紧迫而特殊的任务，即把社会作为整体来把握、分析和解释，并且是在吸收从其他社会科学所获得的一切数据和认识的情况下。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社会政策的对象，就其处于与整体的联系之中而言，是整体的社会及其“组成部分”。与之相应，科学的社会政策对那种就全社会来说是重大的因素，作描

① 这种表述试图避免关于“社会政策语义学上的亏缺”这一指责（A·布格哈特：《社会政策》，第932—933页，见《天主教社会词典》，因斯布鲁克—格拉茨1980年），尽管不满足于流行的定义标准，确切地说是与之矛盾（参见H·阿尔伯特：《社会研究中的科学论问题》，第73—74页，见R·柯尼希所编《经验的社会研究手册》，第I卷，斯图加特1973年）。